

2008年後的青年貧窮再現：
揭露什麼？又遮掩什麼？*
Representation of Youth Poverty since 2008:
What is Revealed and What is Veiled?

陳崇真**

Chung-Chen CHEN

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經濟惡化的影響遍及全球，貧富差距在世界各地成爲社會問題，這背後反映的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危機，而與民衆直接相關的則是失業、低薪等問題，以及在生活中遭遇各種經濟緊縮導致的對未來的擔憂。因此，各種探討當代貧困現象的論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貧富差距、M型社會、階級社會、青年貧窮等等，無不反映當前整體社會正遭遇的各種困境。

這些論述從各種角度談論經濟發展遭遇困境造成的貧困問題。其中，矛頭大多指向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困境。1980年代，美國雷根總統（Ronald Wilson Reagan）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率先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對內以縮減政府支出、擴大私有化、民營化爲主，相應的是雇傭勞動的彈性化，以及減少政府干預並鼓吹競爭的自由市場，對外則以自由貿易作爲全球經濟擴張的發展方式，並以此爲震央席捲全球。

投稿日期：2020年1月14日。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6月15日。

- * 本文內容初發表於文化研究ROUTER X 台社論壇 X 重新思考民主論壇：「又窮又厭世：當代青年的情感政治與貧窮化問題」。本文完稿則由畢業碩論改寫（陳崇真2019），2019年8月初成稿，2020年2月修定。在此感謝巨良邀請參加論壇發表，也感謝智明老師對本文提出的寶貴建議。
- ** 陳崇真，《兩岸叢報》網路編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
聯絡方式：Chungchen0919@gmail.com。

經歷1990年代蘇聯解體與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更讓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造成巨大影響。歷經政策的推廣與運行，1970年代末、1980年代以降出生的世代，遂成長在冷戰結束且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經濟發展的社會。

作為冷戰時期對抗共產主義最前線的臺灣，最早參與資本主義全球化，不僅加入美國垂直分工體系，更緊跟著美國腳步，以美日為核心的加工出口工業化作為經濟發展的圭臬。臺灣的戰後嬰兒潮發生在1940年代，這世代的人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恰逢「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以及臺灣產業轉型為加工出口外銷的年代，因而經歷臺灣經濟起飛，趕上時代更迭的各種浪潮（蕭阿勤2005）。而197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則趕上臺灣在1990年代經濟成長的末期。

1990年以後，臺灣產業受到全球分工下的競爭影響，勞動條件與經濟成長相比卻沒有明顯增長。因此，有關此類以「世代」或「青年貧窮」為主題的報導或文章越來越多，從日本、美國翻譯而來的專書也時有所見，臺灣也有出版如《崩世代》、《厭世代》等專書，專門探討此類貧富不均下的世代貧困問題。甚至2016年政黨三度輪替後，蔡英文總統在總統就職演說上，以「為年輕人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作為開場，說道：

改變年輕人的處境，就是改變國家的處境。一個國家的年輕人沒有未來，這個國家必定沒有未來。幫助年輕人突破困境，實現世代正義，把一個更好的國家交到下一代手上，就是新政府重大的責任。（蔡英文2016/05/20）

將年輕人的困境提升到國家問題的程度，青年貧窮成為被提上檯面呼籲要處理的問題。然而貧困一直以來都是社會常見的問題，也不僅限於某個世代。過往揭露社會底層弱勢的貧窮書寫中，主要將書寫對象聚焦在社會中的某一群體，例如貧民窟、某類型的社會底層民衆、社會邊緣人、弱勢的勞動階級等，例如1980年代的《人間雜誌》便以書寫底層人民處境的紀實報導而聞名，又或近年林立青（2017）《做工的人》專門書寫底層勞動階級的生活辛酸。

這裡就產生一個現象，近年來青年貧窮、世代貧困或貧富差距等等問題，成為社會上的顯學，青年貧窮問題的揭露與世代貧困的書寫，成為報

章媒體或書籍出版中常見的主題，被廣泛的討論與探究。當然經濟危機造成的社會現實，理所當然會成為主流大眾議論的話題，但經濟危機帶來的貧窮處境、貧富差距，所影響的群體又不只是年輕族群，為何貧窮困境會聚焦在一個世代或以青年為主要探討對象呢？

我抱著此好奇，發現大多討論青年貧窮的論述出現在2008年金融海嘯過後，因此我以2008年後至今，以青年貧窮或一個世代遭遇的貧困處境為主題探討的論述，如何在面向社會大眾傳播的文本中書寫，並聚焦以《遠見》雜誌、¹《崩世代》（林宗弘等2011）和《厭世代》（吳承紘2017）作為主要分析的文本，探討這些文本中的青年貧窮論述揭露了什麼問題？又是否掩蓋了什麼問題？這些面對貧窮問題的未雨綢繆，究竟產生的政治意義是對體制的不滿？亦或是中產階級擔憂向下淪陷的社會共鳴？還是其實未產生任何具政治意義的行動？

本文認為青年貧窮論述凸顯世代之間的價值觀參照與對台灣過去經濟榮景的緬懷，卻也掩蓋了階級之間的複製與流動侷限等問題。在青年貧窮的論述中，當越強調世代差異時，日益嚴重的階級差異，以及同世代「年輕人」因身家背景經濟條件不一，而所面對的不同命運，都在青年貧窮的論調中被淡化，而消失在讀者的視角。青年貧窮再現所產生的政治意義遂成為選舉的選票、候選人的政見，失去個人參與社會變革的想像，形成去政治的青年貧窮談法。

一、2008年以後的青年貧窮再現論述發展

若回顧「青年貧窮」一詞的發展歷程，根據新聞媒體的歷史紀錄，「青年貧窮」一詞在臺灣開始出現，是在2004年泛紫聯盟召開「青年，你的名字叫做貧窮！」記者會，訴求工讀時薪的調漲（中央日報編2004/11/4；

1 本文參考《遠見》雜誌2008年至2017年之期別，從第259期到第378期，本文章所參考之期別共計27期（遠見雜誌編2008-2017）。

聯合報編2004/11/11)。²詞彙反映當時社會的氛圍，在2000年爆發網路泡沫經濟化危機後，新貧、工作貧窮、窮忙等問題成為社會廣泛討論的課題。資本主義社會中，擁有工作就能解決貧窮問題，老幼弱殘才是容易陷入貧窮困境的群體，這些既有社會福利運作的概念，在新自由主義發展下開始被推翻，經濟危機造成的低薪、長期失業等問題，促成勞動彈性化及非典型聘僱的發展契機，卻開始造成人們擁有工作卻仍陷入貧窮困境的狀況成為社會常態，年輕的勞動者更是首當其衝，面對低薪衝擊。

在《遠見》雜誌中，可以看到對於青年處境的相關論述，在2008年開始關注的是1970年代以後出生的六年級生，他們成長於臺灣經濟起飛的發展階段，當出社會就業時，卻開始遭逢臺灣經濟發展的困境，甚至遭遇經濟危機。面對新貧、高失業率、工作貧窮等問題，六年級生，尤其後段班（1975年後出生的群體）遭遇極大挑戰。

當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海嘯，當時剛執政的馬政府為解決青年失業率問題，於2009年推出22K政策，原本用意良善的政策，卻使得平均薪資被定住，且影響大學畢業新鮮人的起薪，青年貧窮的問題逐漸成為社會上的顯學。在這之間《遠見》雜誌不時以特別企畫點出青年的困境，但也同時鼓勵年輕人要努力面對困境。

2011年《崩世代》因應2012年的總統大選，原本要推出政策白皮書，最後轉型為朝向一般大眾介紹臺灣處境的專書，書中雖不強調青年貧窮或世代衝突，卻也體現出工作貧窮造成年輕世代的許多困境與問題，例如低薪、買不起房、不敢生小孩等青年貧窮的困境。

從《遠見》雜誌中，可看到從2009年算起，歷經約三年的累積，雖然政府的22K政策減緩了失業率，卻助長低薪問題以及延伸造成的工作貧窮問題，尤其年輕世代成長於相對優渥的環境，出社會工作卻遭逢各種低薪、失業困境，臺灣社會對於青年貧窮的處境展開許多討論。2012年8月《遠見》第314期便以「年輕人憑什麼贏」作為封面主題，針對年輕世代的處境

2 見中央日報編。2004/11/04。〈泛紫聯盟：青年貧窮化扁政抽手〉，《中央日報》；聯合報編。2004/11/11。〈泛紫：重視青年貧窮問題〉，《聯合報》。

推出一系列企畫，而我認為從這一期開始，是個重要的分水嶺，《遠見》開始重視這個社會現象，一邊點出年輕人遭遇的困境，一邊勉勵年輕人振作起來改變困境，以各種成功的勵志事蹟給予鼓勵與希望。

《遠見》維持一貫以來的論調，雖然點出年輕世代遭遇的各種困境，卻也不斷以世代之間的差異作為參照，藉以鼓勵年輕人要吃苦耐勞、努力堅持，在困境中努力不懈。成功案例與勵志故事更是給予年輕人鼓勵與希望，這種一面體現出青年困境又一邊鼓勵年輕人的論調，成為《遠見》再現青年貧窮的一大特色（鄭巨良2004；邱楷恩2013）。

《遠見》雜誌的創辦人與董事長高希均教授，以鮮明的自由主義理念領導《遠見》雜誌的論調與風格。高希均（2017）1977年在《聯合報》發表〈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文，引入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經濟學理念，大意就是每件事都要付出代價、每件事都有機會成本，因此沒有白吃的午餐。這樣的論調，也如實運用在對年輕人的要求與鼓勵上。

然而《遠見》對青年貧窮的處理方式，卻無法面對臺灣社會經濟發展遭遇困境，以及臺灣年輕人大量出走，到薪資更優渥的地方去工作的現實。尤其當2014年太陽花運動後，《遠見》逐漸不再有探討青年貧窮課題的企劃，我認為《遠見》因其鮮明的自由主義理念，難以再用過往的論調談論青年貧窮課題。

在2013年左右，臺灣社會開始出現一股駁斥《遠見》這類要年輕人努力或充滿希望的聲音，並以負能量、厭世作為反撲。面對現實的困境，因為再怎麼努力也難以成為成功案例，再怎麼辛苦也無法扭轉低薪現實，對於《遠見》這類主流論述中的努力說詞，負能量以一種負負得正的方式，消解了努力不見得一定成功的失落感與絕望感。在《遠見》逐漸失去探討青年處境的論調時，厭世、負能量成為再現青年貧窮困境的鮮明論調，2017年的《厭世代》就試圖整理這股厭世氛圍，再現青年貧窮的處境。

在這過程中，六年級後段班逐漸消失在青年貧窮的論述中，取而代之

的是七年級生和八年級生，即是所謂的80後、90後（1980年、1990年後出生的群體）。青年的貧困處境以35歲為界線，從2008年以來，以新貧、工作貧窮、找回上一代的吃苦耐勞，到厭世、負能量等論述成為再現青年貧窮的重要內容。

二、青年貧窮體現出以世代作為對照

前述《遠見》雜誌探討青年貧窮，往往是為了體現臺灣當前經濟發展的困境，而這困境有兩個進一步的解決方向，一個是期待臺灣出現下一個郭台銘、下一個王永慶，只要有少數的年輕精英創業成功，就有機會透過新的產業改變臺灣的未來。另一個解決方向則是期許臺灣的就業市場能夠和諧，傳統產業、中小企業都能獲得充沛勞動力，讓臺灣整體經濟活絡，因此《遠見》一直認為臺灣到處是工作機會，青年貧窮的一大問題在於年輕人挑工作，或年輕人不願吃苦。

《崩世代》回顧臺灣過往透過減稅吸引外資投資設廠，帶動臺灣產業發展的歷史，提出臺灣獨厚資本財團而造就過往的榮景，也因此當臺灣失去廉價勞動力的競爭優勢時，遂也難以留住資本，甚至也留不住臺灣自身的中小企業，而在高科技產業發展下，卻只能造就少數的高薪職缺，而難以帶動臺灣整體經濟發展。也因此，在《崩世代》的論述中，其實原本並沒有要處理世代衝突，因為整體政策環境出問題，影響的不會只是單一世代，而是不同年齡群體。只是因為《崩世代》再現的青年貧窮處境，體現出大環境下造成的工作貧窮問題，進而連帶影響少子女化，以及體現出政府政策問題，因而當太陽花運動爆發時，《崩世代》書中的論述馬上成為呈現世代衝突最佳的內容。

《厭世代》強調世代之間的衝突，並希望可以搭起世代之間溝通的橋梁，可說是跟《遠見》一樣參照過往發展的榮景，卻各自談論兩個不同的面相。《遠見》著重強調過往經濟發展的經濟，不論是吃苦耐勞的打拚精神或是創業家精神。《厭世代》則著重強調因為時空背景不同，不斷參照

過去經驗，反而加深當前年輕世代的困境，買房房價如此高，薪資卻十年沒有成長，世代參照下盡是不同世代間的衝突與無法互相理解。

然而當《厭世代》向上追溯問題到中小企業的困境，進一步也認為工作貧窮、低薪等問題，來自臺灣產業發展問題時，卻也呈現出跟《遠見》相似的論調，認為臺灣還是需要透過產業轉型，以及提供年輕人更友善的舞台，來改善年輕人的困境。在這點上《厭世代》就跟《遠見》沒有太多差異，都認為臺灣的產業與經濟需要轉型發展。

也因此，《厭世代》雖然一開始想要處理世代衝突，並期望搭起世代之間溝通的橋樑，但最後呈現起來，《厭世代》所處理的世代衝突，跟《崩世代》並沒有太大差別，即不好的政策影響的不會只是某個年齡層群體，而是都會影響到。而《厭世代》所提出世代衝突的根本問題，則在於《遠見》這類硬要拿上一世代成功經驗加在當前年輕人身上的論調。

《遠見》、《崩世代》都以過往臺灣經濟的榮景作為臺灣產業發展的參照，因此在這部分兩者都沒有呈現出世代衝突，而《崩世代》則因為對臺灣歷史中減稅招商、發展加工出口、扶持中小企業的政策有所批判，因此認為這樣的政策影響的是每個臺灣民衆，因此一開始並不太強調世代之間有無衝突。

總而言之，以《遠見》、《崩世代》和《厭世代》作為參考，從中看到對於臺灣經濟、產業發展如何變更好的想像，並不存在世代衝突。真正的衝突在於不同世代之間的價值觀與成功經驗難以複製，硬要將過往的價值觀、成功經驗複製到當前的年輕世代身上。這些對於青年貧窮的處境不合時宜的對照，體現出青年貧窮呈現出的世代對照，是緬懷臺灣過往的榮景，以過去經濟的發展作為想像，但也因為拿過去的成功來探討當前的失敗，以及過去的成功經驗難以複製，因而造成衝突與反彈。

上述對不同世代的經濟發展想像不存衝突，卻在價值觀上造成世代衝突的情況，可從馬克思主義中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的概念窺知一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1983: 56-78）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確立並提出

經濟基礎作為下層建築和影響上層建築的概念，認為市民社會是從生產和生產關係等經濟基礎中發展起來的社會型態，由經濟基礎所構成的社會型態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屬於上層建築的基礎，進而形成意識形態。

馬克思（1972: 81-125）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更進一步說明下層建築屬於經濟基礎，以及下層建築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認為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會伴隨相應的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也就是上層建築中的法律、政治、意識形態、價值觀等社會意識。

因此，世代衝突體現出的是馬克思主義中的上層建築，及在文化、價值觀上，甚至是政治上的世代之間差異。而在經濟範疇的下層建築中，世代之間並不存有任何衝突或差異，對於經濟的發展想像並沒有世代上的衝突。不論是《崩世代》跟《遠見》之間對於經濟發展的想像，只存有彼此的差異，但不存在不同世代之間對於經濟發展想像的衝突。

三、青年貧窮談的不只是青年，也不僅是貧窮

如果以為再現青年貧窮會看到青年悲慘的貧窮處境，可能會大失所望。如前述所說，青年貧窮的再現大多圍繞在青年低薪、工作貧窮的困境，並延伸探討低薪問題、產業發展問題，以及年輕世代如何應對困境的方式。因此在《遠見》雜誌中，可以看到《遠見》對於青年貧窮的呈現，一邊點出青年困境，但同時也參照上一代的經驗，給予鼓勵，提供各種勵志故事、成功經歷。

而從《崩世代》的政策白皮書到《厭世代》對抗勵志的厭世浪潮，也從青年困境談論到低薪問題、產業發展問題。青年貧窮本身，其實不是聚焦在談論青年人遭遇的貧窮處境，這些青年貧窮的問題只是突顯低薪問題、產業問題，臺灣的經濟發展問題。青年貧窮實際上既不只談青年，也不只談貧窮。

例如《遠見》一路以來都非常關心年輕人的發展與出路，一直以各

種特別企畫、封面故事來鼓勵與勉勵年輕人，雖然這些成功經驗、勵志故事都可說是普遍低薪大環境中的特殊案例，但《遠見》提出了面對大環境下，個人如何以對的建言與鼓勵。這樣的鼓勵雖然後來得到厭世作為反撲的回應，但不論是勵志或厭世，都是個人如何應對困頓大環境的方式，而那困頓的大環境由於已經是錯縱複雜的產業問題、經濟發展問題，因而不論是主流以《遠見》為代表的論述，或是《崩世代》、《厭世代》想反擊主流論述的論調，最後也都指向政策問題。

在前面的章節中，都提及青年貧窮反映宏觀政策的狀況，也因此青年貧窮的面相探討起來多且廣。《遠見》、《崩世代》、《厭世代》這些文本的論調基本上都以年輕人遭遇高失業率、低就業率，以及就業卻領低薪等等問題為出發點，而當收入或生活都不穩定時，進一步討論買房、成家與少子女化的問題，因此房屋政策、少子女化的問題，都與年輕群體的狀態息息相關。

而若探討為什麼造成高失業率、低就業率與低薪問題時，討論的方向就會往臺灣經濟發展問題，或產業發展問題上偏。此外，有關學用落差也是青年貧窮的一大問題，因此就會朝臺灣高等教育體制的面向，進一步探討年輕人從大學畢業後的就業問題。上述課題都非常大，但又都能聚焦到青年貧窮，並帶出這個世代的青年遭遇上述這些問題的困境。

因此，青年貧窮最終指向整個臺灣的發展問題，連最具創造力、活力，理應成為社會中進步動能的年輕人都對未來感到絕望。年輕人因為失業率與低薪問題，感到就業環境的不友善，或由於工作貧窮、窮忙，對生活只剩下工作的處境感到絕望，或對高房價買不起房而感到無比失落，因而現實問題並非是貧窮問題，而是對未來沒有希望而感到貧困感。這些貧困感全都指向政府的政策問題。

但由於是政策問題，受影響的也不僅僅只是青年，青年貧窮呈現的整體社會困境影響到的是一整個世代中的不同年齡群體，只是以年輕人作為重要的論述對象。因此談的雖然是青年貧窮，但其實不只談青年，也並非談貧窮。而是一個社會整體發展遭遇的困境。貧窮也非社福領域定義下的

貧窮問題，而是在物價上漲、薪資不高、房價高升的情境下，對未來感到絕望的「貧困」問題。青年貧窮，因此成為臺灣發展困境的代名詞。

從這也體現「貧窮」的概念越來越複雜，當青年貧窮被突顯為社會發展的困境時，該如何面對過往貧窮線所定義的貧窮問題。對此，可從社福專業出發的研究窺見一二。例如黃世鑫等人（2003）便提出舊有貧窮的概念被挑戰，「新貧」問題呈現窮人結構的改變，接受社會救助者不僅人數提升，並有年輕失業者比例提升的問題。

「新貧」有別於舊有貧窮概念，將問題指向更宏觀龐大的社會結構問題，也將貧窮的對象擴大到更大的範疇，例如經濟全球化或不穩定就業的增加，而有工作其薪資卻無法滿足生活所需者，成為不被政府福利制度所保障，而屬於「新貧」問題的主要群體（吳佩瑩2005）。

因此社福專業的學者也開始提出政府若仍以「發展經濟」為公共政策的目標，面對新貧問題仍「不加思索的奉新右派主張為圭臬」，那終究只是持續製造新貧問題，而非解決問題（呂朝賢2007）。當貧窮概念遭逢時代變遷的挑戰，青年貧窮的論述體現的貧窮問題並非過往貧窮線等指標所能概括。

四、大環境問題與年輕人問題的脫鉤

我認為從上述青年貧窮再現的論述中，體現出世代之間的參照，既有世代之間對於經濟發展的一致願景，但也有世代之間價值觀上的衝突，最後當青年貧窮所探討的課題包山包海，也逐漸形成個人難以面對與處理的社會大問題。

《遠見》雜誌在呈現青年貧窮的處境時，一向都是政策歸政策、個人歸個人。因此，面對宏觀的政策問題、大環境問題，《遠見》時常有其他的特別企畫專門探討，或訪問專家學者、政府官員的意見，甚至從官方的角度去看待這些問題如何解決。

因此《遠見》在提出年輕世代的困境時，總會話鋒一轉，開始點出困境中也有成功的案例，或是藉由世代之間的對照，來勉勵年輕世代。《遠見》很明確的表現出政策問題是政府的事，至於在大環境的困境中，個人就要各憑本事來面對困難與挑戰，但只要能在困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與努力的方向，就能為臺灣社會盡一份力。

而從《崩世代》到《厭世代》中，我認為《崩世代》從宏觀的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困境，逐漸講到臺灣重視財團的經濟與產業發展問題，進而逐漸往下發展談到工作貧窮，以及進入到家戶的少子女化問題。《厭世代》則從訪問個案，從個人的經歷與處境逐漸向上挖掘到中小企業的困境，進而提出臺灣產業發展帶動經濟的期待，並藉此搭起世代之間對話的橋樑。

在《崩世代》與《厭世代》的論述中，體現兩個面向，第一個是批判政府、但也相信政府，因為依然將期待放在造成問題的政府身上。第二個面向是雖然強調不應該將問題視為個人問題，但在如何解決個人遭遇的困境發展時，都是從結構面、政策面去談及，個人遭遇的困境因而只能被動等待政策的調整。而人的主體性在此論述安排下，便逐漸消失了。儘管《崩世代》在書中也提出關心政策、關心議題的參與方式，試圖建立起個人與社會問題之間的連結，但這種連結對於參與社會改變的想像還是有所侷限與不足。

當《遠見》雜誌的對於青年貧窮的論述，呈現出政策歸政策，個人歸個人的論調時，《崩世代》、《厭世代》一邊認為不該將整體工作貧窮問題限定於個人問題，卻也期待政府一定要改革施政方針，我認為這也加強了政策歸政策、個人歸個人的論調。假若政府的政策一直不改善，個人就得一直面對工作貧窮嗎？當政策發展與個人問題之間的關係，開始拉開距離、失去連結，就變成大眾一邊期待政府改善，另一邊面對生活中的各種現實困境，又只能想辦法各自努力。

尤其厭世作為一種對抗主流正能量的方式，其實也是一種讓人在面對社會問題時，得以繼續在社會困境中生存的「反勵志」的一種勵志方式，成爲一種反對正能量的「正向負能量」。但其實這種「正向負能量」跟其

原本要對抗的「正能量」，都在提供個人如何在職場上、或困境中生存下去的鼓勵與支持，甚至由於厭世、負能量更誠實面對社會環境的不友善，以及指出社會上的諸多問題，因此這股能支持在困境中生存下去的「正向負能量」比《遠見》那種「正能量」更為有用。

貧窮問題如何被揭露並讓大眾正視，一直是貧窮書寫作為文化行動的政治目的。然而過往貧窮的不被看見，比較聚焦在特定對象的書寫（貧民窟、底層弱勢群體）。但我透過研究與分析《遠見》雜誌、《崩世代》、《厭世代》這些文本如何再現青年貧窮，我認為當書寫的群體由個人的處境逐漸發展到宏觀的政策問題時，在這過程中也抽象化了貧困的群體，也因為群體的抽象化，提出的解決方案或建議，也會比較傾向從政策面著手。因此我認為再現手法與指出問題之間，具有當再現的群體趨於抽象，而提出的反應就越趨向於政策的情形。

我認為在這過程中，由於個人與政策之間的距離，以及問題越來越趨抽象，導致個人面對龐大問題時，只能處理個人問題，而對社會問題、政策問題產生無力感並因而失去連結。也因而將政策變革的期望，交付給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的對象，可能是某個政黨、政治人物，或是某個團體領袖。而這樣的狀態使得個人參與社會變革的可能性變低，也失去個人參與社會變革的想像。

因此，為何當青年貧窮的問題連主流媒體、報章雜誌都在熱烈討論，也都提出各種問題時，卻也僅僅只是提出問題而已，而沒有產生更具政治意義的行動。而個人面對青年貧窮這包山包海的龐大社會問題，最終只能尋找如何在充滿困境的社會中找到繼續生存的動力或方法。因此我認為從《遠見》雜誌、《崩世代》到《厭世代》再現青年貧窮的論述中，體現出為何青年貧窮已經是臺灣社會、甚至全球熱烈討論的話題時，青年貧窮雖然點出了問題，卻也僅僅點出問題。

我也進一步認為，這能解釋為何當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就職時，會在就職演說中將青年的困境上綱到是國家發展的困境，以及在近幾年的選舉中，為何青年的處境總能成為賣點，成為各候選人提出的選舉政策。也正

因為如此，當青年貧窮的論述都導向大環境的政策問題時，所產生的政治行動意義在臺灣只是化成選舉的選票、候選人的政見，並失去了個人參與社會變革的想像，以及其他參與政治方式的想像，例如參加工會、監督政府的政策或對這社會體制有不同的期待或想像等等。我認為這樣的青年貧窮論調反而造成一種去政治的情況。

五、結論：青年貧窮——揭露什麼？又遮掩什麼？

青年貧窮所框定的範圍當然是年輕群體，但也因為只聚焦年輕世代的處境來談，就輕忽了其他群體的處境。可說青年貧窮的論調，凸顯了年輕世代的處境，進一步體現臺灣整體政策發展的困局，然而也因此遮掩住了貧富差距、階級分化等更普遍的社會問題。

中國紀錄片研究學者呂新雨（2008），在其《書寫與遮蔽》一書的封面寫著：「書寫既是一個敞開同時也是遮蔽的過程。然而，書寫永遠負擔著一個使命，那就是指向被遮蔽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對書寫本身的懷疑與反思，正是書寫的動力。」我在上述探究青年貧窮再現的現象時，也同時意識到青年貧窮聚焦青年處境談論，實際上凸顯了世代衝突，卻也因此隱匿了貧富差距的問題與階級問題。

在這樣的論調中，社會上的問題聚焦在年輕人的處境，然而社會上原本的弱勢群體，比如前述所說單親家庭、都市原住民等，實際上也共同面對一樣的社會環境與問題。有錢人跟弱勢群體同樣面臨社會的發展困境與經濟不景氣，但在青年貧窮的論述中，凸顯的卻是世代之間的價值觀參照或對過去的緬懷，進而呈現世代之間的差異。然而貧富之間的差異、階級之間的複製與流動，就在青年貧窮的論述中被遮掩了。

例如步入中年的群體需要養育小孩、又有照顧長輩，夾在中間的處境，同樣的不景氣，所導致的低薪或失業率，更是衝擊極大。³而老年人的

3 例如聯合新聞網在2016年就曾經以「流沙中年」為企畫主題，報導40多歲的中

長照問題，假如也陷入貧困處境，其處境與年輕人相比，又更是容易跌入社會的最底層。當經濟危機導致社會遭遇困境時，年輕人的低薪處境能壓低人事成本，但年長一輩或資歷較深者，就很容易成為被裁員的對象，即透過年輕人低薪與裁員資深工作者，進而縮減人事成本。

因此，主流論述聚焦強調青年貧窮的處境，卻也因此忽略其他年齡層遭遇不同的困境，尤其社會更弱勢群體的處境就更難被看到，⁴貧富差距、階級問題也在世代衝突下被轉移。即是說，青年貧窮凸顯世代之間的衝突，卻也因此淡化貧富差距，以及世代之間階級複製的問題。

這並非說年輕人的困境不存在，而是強調出不論是否為年輕人，遭遇低薪問題、失業問題，都會陷入貧窮或失去希望的困境中。強調青年的處境與貧窮，容易導向經濟產業如何發展的政策問題，並轉移貧富差距造成的階級流動問題與階級複製的問題。

我認為《遠見》、《崩世代》和《厭世代》這三組論述的共通之處，在於強調世代差異的同時，卻也使得日益嚴重的階級差異，以及同世代「年輕人」命運的不同，淡出了讀者的視野，有效地將社會普遍的貧富差距問題轉為世代之間的衝突，但世代之間的衝突其實只有價值觀上的衝突，然而在經濟發展上，其實並沒不衝突。因此世代衝突有效轉移了貧富差距，以及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的階級複製問題。這也進一步凸顯主流青年貧窮論述，真正關心的是如何找回臺灣過往的經濟榮景，因此最終導致個人困境與社會宏觀政策之間出現距離，造成去政治化的問題。

眼前臺灣面對新自由主義發展遭遇的困境，其實歷史上也層出不窮，甚至在資本主義社會初發展階段就已有跡可循。例如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初期，工業革命帶來資本主義社會初發展下，恩格斯與狄更斯便敏銳地觀

年世代面臨低薪、窮忙，卻得同時遭遇長照問題或子女養育的問題（聯合新聞網編2016/10/03）。

4 例如林立青（2017）的《做工的人》，就描寫社會弱勢群體難以被看到的處境。而這難以被看到，在於主流論述將這些弱勢群體化作可憐底層的樣貌，而當談論整體社會氛圍時，將底層弱勢與普遍大眾的困境分開來談。因此在青年貧窮的群體中，很難看到這樣的底層弱勢群體。

察到英國社會上的貧窮困境，兩人創新且具革新意義的書寫，不僅在當時掀起熱論，以現在來看也是書寫內容形式上的創始者地位。⁵狄更斯首度以底層民衆為主要角色，並在小說中嘗試扭轉上尊下卑價值觀（斯邁利2005: 26-30），恩格斯首次指出無產階級能夠自己幫助自己，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列寧1972: 38-39）。

但狄更斯與恩格斯兩人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如何讓社會變得更好的想像，以及個人跟社會這大環境如何產生連結的想像。狄更斯追求的是社會的和諧，因此對於社會政治經濟的運作並不批判，但狄更斯非常重視個人在社會中是否盡了其該負起的社會責任，如果是底層民衆就是要透過努力工作讓生活得以過的更好，如果是統治者就該積極處理社會弊病，有錢人更該遵循道德良知改善這社會的問題。狄更斯相信個人的道德良善，能更促使社會更加和諧運作，這一信念也表現在他的小說裡（斯邁利2005）。

恩格斯則在日後與馬克思一同發展馬克思主義，與當時許多社會主義者進行路線對抗，並也積極投入共產主義運動，相信無產階級的覺醒能推翻資本主義社會，並帶來一個更理想、更公平更符合正義的社會。而恩格斯提出的無產階級作為改變的主體，是一種將資本主義社會與個人連結起來的論述方式，透過生產中的關係，上銜接到政治與經濟的分析，向下銜接無產階級作為改革的主體（科爾紐1980）。相比下，狄更斯的文字中，只顯露出個人要如何社會中以道德良善來為這社會的運作增添一分力，當每個人都存好心做好事，就能促進社會和諧並使其變得更好。

可以從《遠見》雜誌再現社會問題的方式看到狄更斯的影子，也因此我認為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或許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參考方向。恩格斯（1983）透過生產與生產關係，將個人的問題與社會問題連結起

5 狄更斯於1837年到1839年之間於雜誌上連載《孤雛淚》後沒幾年，恩格斯在1842年來到英國，開始他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田野考察，並於1844年至1845年之間寫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不論是狄更斯小說裡反映的社會問題，或恩格斯在文章中揭露的工人處境，都剛好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統治時期，也是所謂「維多利亞時代」剛開始的年代。

來，因此提出受苦受難的人們是社會變革的主體，無產階級是變革的根源，是改變的可能。

即是說，在提出問題的同時，所關心的是經濟發展中人的問題，在面對經濟危機自身的矛盾時，同時提出弱勢群體如何自立自強，形成社會變革的主體，而在此情況下，所要解決的不僅是經濟發展的經濟危機困境，更是直面貧富差距所造成的受壓迫者，以及將受壓迫的勞動者、弱勢群體視為充滿政治性的、參與進社會變革的主體。

但這不表示我認為恩格斯在19世紀初談論階級的論述，可以直接照搬到當前社會，作為解決當前社會困境的方式，也並不表示我認為恩格斯當時的分析方式可套進臺灣當前處境，建立起個人與社會問題之間的連結。我認為恩格斯在資本主義社會初發展的維多利亞時代，便以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式，得出許多精闢的論點，恩格斯的方法或許會是可以參考的方向。這即是說在剖析社會問題時，除建立起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緊密關係與社會連結，更應思考個人與經濟危機之間的關係，思考自身與社會變革的關聯。不因陷入世代之爭，而無視貧富差距的問題；不因追求經濟的發展，而將希望寄託在投給某個政黨或政治強人，進而消除自身參與社會的其他政治性。

本文以2008年金融海嘯作為起點，探討之後青年貧窮論述的再現，這之間歷經馬英九政府8年執政，以及蔡英文政府在2016年的政黨輪替。實際上在這過程中，青年貧窮的論述大多集中在對以馬政府為首的國民黨不滿，而青年貧窮導向宏觀政策的改革，期待的是有更好的政府能做出變革，對好政府的期待當然並非寄盼國民黨改革，而是指向民進黨。當然對藍綠政黨不期不待者，也將希望看向藍綠之外的新興政黨，有助小黨發展。

我是從2018年春開始研究此課題，在收集資料與文本的過程中，深刻感受到從2017年以後，青年貧窮的相關討論越來越少，現在回頭來看，2017年末出版的《厭世代》可說是分水嶺。到了2018年地方選舉，以及從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的總統大選，青年政策仍是各候選人不得忽視的重

要課題；尤其韓國瑜與蔡英文的總統競選，更拉出世代分裂的重大爭議，但主流論述中卻難再看到像本文中所提，以青年貧窮概括各種政策問題的論調，更不用說從青年角度出發對執政當局不滿的批判。

這也讓我更有底氣地指出過去青年貧窮再現的論述，其所期待的某個政黨或政治強人，是明確地指向民進黨的執政。而期待民進黨執政後的改革，更是青年貧窮論述消解個人參與社會改革的一大原因。當然，若有論者認為民進黨執政數年間，有效改革前述文中所提青年貧窮概括的宏觀政策問題，包括低薪、居住、育幼、高教等問題，那也不無可能，有待日後持續檢視與觀察。但若延續本文的觀點，日後可持續追問：是否民進黨執政後，青年貧窮問題有所解決？年輕人不再那麼感到厭世？抑或青年貧窮論述幫助了民進黨執政，卻也消滅自身作為議題的可存在性？

引用書目

- Cornu, August (奧古斯特·科爾紐)，管士濱 (Guan, Shi-Bin) 譯。1980。《馬克思恩格斯傳III：1845-1846》*Marx Engels Chuan III: 1845-1846*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III: 1845-1846]，頁124-129。北京 (Beiji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DX Joint Publishing)。
-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The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編譯。1983。〈英國工人階級狀況〉“Yingguo gongren jieji zhuang kuang”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 Engels quanji*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2，頁269-564。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 Lenin (列寧)，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 (The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編譯。1972。〈弗裡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Friedrich Engels]，《列寧全集》*Lenin quanji* [Complete works of Lenin] 2，頁38-39。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 Marx, Karl (馬克思)，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The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編譯。1972。〈政治經濟學批判〉“Zhengzhi jingji xue pipan”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arx Engels xuanji* [Marx & Engels Selected Works] 2，頁81-125。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馬克思、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The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編譯。1983。〈德意志意識形態〉“Deyizhi yishixingtai” [The German Ideology]，《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 Engels quanji*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3，頁56-78。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Smiley, Jane (珍·斯邁利)，鄭惠芬 (Zheng, Hui-Fen) 譯。2005。《狄更斯：尋找救贖與幸福的小說家》*Digengsi: xunzhao jiushu yu xinfu de xiaoshuojia* [Charles Dickens: A Novelist looking for salvation and happiness]。臺北 (Taipei)：左岸文化 (Rive Gauche Publishing)。

吳佩瑩 (Wu, Pe-Yin)。2005。《新貧問題與社會救助政策的改革》*Xinpin wenti yu shehui jiuzhu zhengce de gaige* [New Poverty and Reform of Social Assistance Policies]。嘉義 (chiayi)：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zhongzheng daxue suoshi lunwen* [Master Thesis,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吳承紘 (Wu, Kelvin)。2017。《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Yan shidai: dixin, pinqiong yu kanbujian de weilai* [The Generation of Tiredness: Low Wages, Poverty and Inability to See the Future]。新北市 (New Taipei City)：月熊出版 (Moon Bear Publishing House)。

呂朝賢 (Leu, Chao-Hsien)。2007。〈「新貧」的意義、政策及其限制〉“‘Xin pin’ de yiyi、zhengce ji qi xianzhi” [Significance, Policy and Limited of the New Poor]，〈社區發展季刊〉*Shequ Fazhan Jik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119: 20-39。

呂新雨 (Lu, Xin-Yu)。2008。《書寫與遮蔽：影像、傳媒與文化論集》*Shuxie yu zhebi: yingxiang chuanmei yu wenhua lunji* [Writing and Covering: Essays on Images, Media, and Culture]。廣西 (Guangxi)：廣西師大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Press)。

林立青 (Lin, Li-Ching)。2017。《做工的人》*Zuo gong de ren* [Working Man]。臺北 (Taipei)：寶瓶 (Aquarius)。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 (Lin, Thung-Hong, Hong, Jing-Shu, Li, Jian-Hong, Wang, Zhao-Qing and Zhang, Feng-Yi)。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Bengshidai: caituan hua, pinqiong hua yu shaozinv hua de weiji* [Generation of Collapse: Crises of Capital Monopoly, Poverty, and the Lowest Fertility in Taiwan]。台北 (Taipei)：臺灣勞工陣線協會 (Taiwan Labor Front)。

邱楷恩 (Chiu, Kai-En)。2013。《「草莓世代」的建構與想像》“*Caomei*

shidai” de jiangou yu xiangxiang [Construction and Imagination of “Strawberry Generation”]。臺北 (Taipei)：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Guoli zhenzhi daxue suoshi lunwen [Master Thesis, Cheng-chi University]。

高希均 (Charles Kao)。2017。《翻轉白吃的午餐：台灣從小龍年代到溫水青蛙的警示》*Fanzhuan baichi de wucan: taiwan cong xiaolong niandai dao wenshui qingwa de jingshi*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臺北 (Taipei)：天下文化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陳崇真 (Chen, Chung-Chen)。2019。《2008年後的青年貧窮再現：揭露什麼？又遮掩什麼？》*2008 nianhou de qingnian pinqiong zaixian: jieru shenme? You zeyan shenme?* [Representation of Youth Poverty since 2008: What is Revealed and What is Veiled?]。世新大學碩士論文Shixin daxue suoshi lunwen [Master’s Thesis, Shih Hsin University]，未出版 (unpublished)。

黃世鑫、林志鴻、林昭吟 (Huang, Shih-Hsin, Lin Chih-Hong and Lin Chao-Yin)。2003。〈新貧問題與社會福利政策——科學 vs. 價值 & 菁英 vs. 普羅〉“xinpin wenti yu shehui fuli zhengce: kexue vs jiazhi he jingying vs puluo” [New Poverty and Social Welfare Policy: Science vs. Value and the Élite vs. the Proletariat]，《國家政策季刊》*Guojia Zhengce Jikan* [National Policy Quarterly] 2(4): 83-124。

遠見雜誌編 (Editors of Global Views Monthly)。2008-2017。《遠見》*Yuanjian* [Global Views Monthly]。第262、266、267、270、273、274、286、287、307、310、314、316、317、319、321、322、324、326、329、334、335、337、345、349、351、352、376期。臺北 (Taipei)：天下文化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蔡英文 (Tsai, Ing-Wen)。2016/05/20。〈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蔡英文女士就職演說〉“Zhonghua minguo di 14 ren zongtong Tsai Ing-Wen nushi jiuzhi yanshuo” [Inaugural Address of ROC 14th-Term President Tsai Ing-Wen]。《中華民國總統府新聞》*Zhonghua minguo zongtongfu xinwen* [News Release, Office of President,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0444> on Jul 21, 2018.

鄭亘良 (Cheng, Keng-Liang)。2004/09/03。〈論「年級論」——年級現象的初步探討〉“lun ‘nianji lun’: nianji xianxiang de chubu tantao” [About the Discourse of “Nianji”: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of Nianjin]。《重裝Reset》*Zhongzhuang Reset* [Reset]。Retrieved from: <http://sex.ncu.edu.tw/reset/?p=606> on Aug 26, 2018.

蕭阿勤 (Hsiao, A-Chin)。2005。〈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臺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Shidai rentong yu lishi xushi: taiwan yi jiu qi ling nian dai ‘hui gui xian shi’ shi dai de xing cheng” [Gener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The Emergence of the “Back-to-Reality” Generation

in 1970s Taiwan]。《臺灣社會學》*Taiwan Shehuixue* [*Taiwan Sociology*] 9: 1-58。

聯合新聞網編 (Udn.com)。2016/10/03。〈流沙中年〉“liusha zhongnian” [Quicksand Middle Age]。聯合新聞網 *Lianhe Xinwen Wang* [UDN]。Retrieved from: https://udn.com/upf/newmedia/2016_data/20161003_quicksand_middle_age/index.html on May 29, 2019.